

抗战大后方

社团翻译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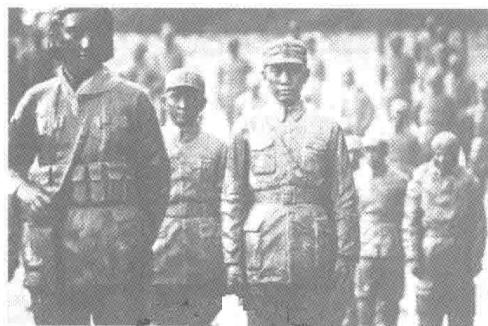


熊辉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抗战大后方

社团翻译文学研究



熊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研究/熊辉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2972 - 9

I. ①抗… II. ①熊…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翻译—研究②抗战文艺研究—中国 IV. ①I046②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035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南大学重大科研专项项目“当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与
中国文化自信力的提升”（SWU1709732）资助成果。

重庆市作家协会文艺创作项目资助成果。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文协”的翻译文学研究	23
第一节 “文协”及其翻译文学研究现状	23
第二节 “文协”的文学立场	38
第三节 “文协”的翻译文学概貌	50
第四节 “文协”的变迁与翻译选择	65
第五节 “文协”翻译文学的特征	73
第二章 战国策派的翻译文学研究	93
第一节 战国策派及其翻译文学研究现状	93
第二节 战国策派的翻译文学概貌	100
第三节 时代语境下的文学选择：战国策派的翻译文学	108
第四节 演绎文艺思想的另类翻译实践：战国策派的 文学改编	121



第五节 战国策派的文学翻译思想	134
第三章 西南联大的翻译文学研究	142
第一节 西南联大作家群及其翻译文学研究现状	142
第二节 西南联大作家群体的社团特征	150
第三节 西南联大翻译文学的兴盛	155
第四节 翻译文学与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	173
第五节 翻译文学与抗战语境下的生命体验	189
第四章 “七月派”的翻译文学研究	207
第一节 “七月派”及其翻译文学研究现状	207
第二节 “七月派”的翻译文学概况	214
第三节 “七月派”对日本反战文学的翻译	223
第四节 “七月派”对苏俄及欧美文学作品的译介	237
第五节 “七月派”对外国文论的翻译	242
第五章 中苏文化协会的翻译文学研究	251
第一节 中苏文化协会及其翻译文学研究现状	251
第二节 中苏文化协会译介俄苏文学的概况	258
第三节 中苏文化协会翻译文学的特征	282
第四节 俄苏文学翻译的中国情结	298
参考文献	312
后 记	323

绪 论

一 研究对象及价值

如何界定文学社团？抗战大后方究竟包括哪些重要的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翻译活动和文学译介有什么研究价值？应该如何去研究抗战大后方社团的翻译活动？对这些问题的界定与回答是本课题得以展开的基础。

既然是研究抗战大后方社团的翻译文学，那就得厘清什么是社团。长期以来，人们将文学社团的讨论与文学流派捆绑在一起，这种做法自然有较多的合理因素，毕竟每个文学社团都有相对统一的创作主张和相对稳定的创作风格，这样就易于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同时，具有相同创作风格的某些流派很容易积聚起一批作家，组建成稳定的文学社团。而实际上，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寿桐先生曾对二者加以如下甄别：“人们将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并称，或许是因为它们都是一定的集合体，不过文学社团是文人的集合体，文学流派是风格的集合体，其差异性不容忽略，随便将这两个现象加以并称，反映了我们学术上的粗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并称往往导致人们认识上的如此误区：一定的文学社团必然

对应于一定的文学流派，正像人们认定文学研究会是现实主义的，而创造社必然是浪漫主义的一样。”^①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既相区别又相重合，按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就可以将具有不同创作风格的文人群体界定为社团。比如抗战大后方的西南联大作家群，它就是一个汇聚了各种创作风格的文人组成的社团；又比如“战国策派”，其成员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创作主张和风格，但因为是文人结社性质的团体，仍然可以将之视为一个社团；此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七月派”“中苏文化协会”等，都可以根据它们是文人的集合体而视之为社团。虽然这些团体不全是文学社团，但它们无疑都参与了中国抗战文学的建设，并且有自己的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想，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与文学相关的社团。因此，本课题主要探讨这些文学社团的翻译活动与文学译介，从翻译文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抗战社团与抗战文学的关系，同时研究各社团内部文学翻译的差异与共性。

文学社团是抗战大后方丰富文学活动的载体，而外国文学对社团创作的影响又是通过翻译的中介活动来实现的。在本课题看来，没有大后方文学社团的办刊热情和创作经验，我们今天很难见到蔚为壮观的大后方抗战文学图景，很多优秀的抗战文学作品也会因为阵地的缺乏而难以和读者见面，更难以从历史的风尘中保留下来。与此同时，翻译文学是大后方文学社团创作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其创作的重要资源，但对大后方社团文学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翻译文学。因此，本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团的翻译文学上。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学营养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阅读外文原文、阅读翻

^① 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译作品、接受外国文学教育。清末民初，尽管接受西式教育的人数比先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国内擅长外语并精通翻译的人依然不多，所以大多数国人只有通过阅读翻译作品来了解并认知外国文学。有学者在谈论中国近代以来接触西学的普遍情形时说：“严复是当时寥寥无几的翻译大师之一，他的教育背景和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几乎无人能及，所以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刘师培对西学较严复为肤浅的理解，却恰好代表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程度，因为他们与刘氏一样，既不通外文，又受过多年中国旧式教育，差不多有共同的知识基础。”^①即便到了五四时期，刘师培接受西学的方式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即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阅读翻译文学来实现的，像五四一代能读懂外语原文的诗人，比如胡适、郭沫若、冰心、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等翻译的外国诗歌在审美上造成的新奇效果诱发了多数不懂外文的读者对翻译文学的模仿，这种模仿型的创作最终促成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抗战时期，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以及反战文学的发展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借鉴资源，文学社团的翻译活动带动了其创作的发展。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通过阅读翻译文学来获得对外国抗战文学的认知，鼓舞了他们同日本侵略者殊死斗争的勇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后方社团的翻译文学给译者和读者的情感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感染，丰富并提升了中国的抗战文学。

从已有的研究看，人们往往注重从创作的角度来讨论社团，将大后方文学社团的发展演变过程置于翻译文化语境中来加以考察的成果并不多见，也没有专门的著作问世。而实际情况却是，大后方

^① 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0页。

社团的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的翻译一脉相承，所以本课题研究社团的翻译文学就具有开创意义和学术价值。周作人曾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①正是思想内容的转变吁求着文体的变化，政治意识形态分割后的文学话语环境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外国的抗战文学和民族意识浓厚的作品得到了大量的翻译，而译文则多采用了浅显易懂的语言形式，目的是传递出外国文学作品的抗争精神，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管形式如何，每一时期的文学都会相应地承载并表达出它所属时代的情感内容，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充分表现了各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只是到了近代，新思想的引入才对其提出了形式革新的要求。翻译文学在抗战时期的文艺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抗战文学中也构成了一定规模。但是文学翻译也像文学创作一样，受译者自身的文化环境、文学观念等因素制约，抗战时期的翻译文学译介就凸显出了抗战的时代特性。此外，不同的文艺方针和意识形态也会导致翻译文学负载不同的文化。从刊物的意识形态入手，去探讨翻译文学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文学意蕴和政治倾向，将更有助于理解抗战时期的文化特质。所以，探讨大后方社团的翻译文学及其对中国抗战文学语境的顺应更具针对性和价值。

将抗战大后方文学社团的翻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为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

了廓清抗战大后方的文学社团及其翻译作品的基本面貌，也是为了通过具体而微观的研究开掘出更加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更加开阔的研究空间。文学翻译是一项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文学作为其成果就成了文化交流的必要中介。考察抗战大后方社团的翻译文学，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基本情况，进一步理解当时文学社团的创作活动及文学旨趣，从社会需要的角度为我们今天的文学翻译活动提供诸多的参考和实践经验。同时，文学翻译通过引入外国文化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清新之风；通过消除语言隔膜让译语国读者领会异国文化风情和精髓，进而在宏大的文化比较视野中体认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向。抗战时期社团的翻译文学不仅顺应了自身的创作主张，而且满足了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文学需求，奠定了苏俄文学在现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使之染上了浓厚的欧化（准确地讲是外化）色彩；促进了早期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发展演变。此外，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既以“他者”的身份通过外部影响来促进民族文学的发展，又以民族文学构成要素的身份直接参与了大后方文学的建构。因此，大后方文学社团的翻译文学对中国社会和现代文学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研究该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以及翻译文学文本就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研究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将丰富抗战时期文学社团的研究内容和视角。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地图上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本课题立意发掘其文学性、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等内容，从翻译文学之镜中窥见抗战文学及社团文学被遮蔽的一些属性。研究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的文学性和文学史价值，将突破“启蒙”“革命”和“言志”的阐释体系，超越“传统/现代”



或“域外/境内”的二元研究模式，展示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以及抗战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与本真面貌。本课题将深化对抗战大后方社团及其翻译文学的阶段性认识，揭示在不同阶段、不同的社团内部重要作家与译者的社会意识、精神世界、战争心理，以及翻译选择与中国抗战文学之间极为密切的各种潜隐关系。展示抗战时期文学社团、翻译文学与中国抗战文学之间多元的“融合”空间，探讨不同阶段的语境对翻译文学的诉求或翻译文学对中国抗战文学不可规避的影响，从而阐明翻译文学对抗战文学影响的合法性以及二者不可辩驳的艺术和现实关联。

从具体的翻译现象和翻译文本出发，拓展出抗战大后方社团研究的有效空间。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本课题负责人整理出大量抗战大后方的翻译文学作品，而现有的大后方翻译文学大都被“进步”的苏俄翻译文学遮蔽，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苏联文学、莎士比亚戏剧等方面，对其丰富性的还原必将赋予本课题更为开阔的研究空间。在整体描述各国文学翻译概况的同时，应注意考察它们多元的复合型关系，应说明各社团文学的译介与20世纪20—30年代的承传与积淀关系，以敞亮抗战时期的翻译与先前相比在主题和艺术上的差异，并找到抗战时期的文学社团与五四时期文学社团的融合与超越。在论述抗战语境对社团翻译文学的诉求以及对中国抗战文学的意义时，应思考社团翻译文学与创作之间深刻的文化关联及共同承载的文学使命，应厘清二者潜隐或显现的关系纠葛，不断澄清社团翻译文学与中国抗战文学和抗战现实之顺向和逆向关系。在注重翻译文学文本研究的同时应注意引入文化研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内容，涉及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文体形式、精神内容的特殊性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建构；涉及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

学的出版、传播和社会影响；涉及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在翻译层面的“变形”，翻译文本与源文本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在各自所属的文化语境中的“形象”问题等，这些内容可以让人们充分了解抗战大后方的文学社团及其翻译文学的总体特征。

总之，本课题不是为了将研究固定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下，也不是为了呈现均质的、“进程”式的抑或先验性的社团翻译文学与抗战文学之间的主题纠葛，而是试图在方法论上建立起中国文学社团、翻译文学和抗战文学之间的多维艺术空间，在差异的共时性中展示并反思抗战大后方的社团翻译文学，使其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收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抗战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特殊的观照方式已经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且大后方文学社团的创作成就与对民族抗战胜利的推动作用也已被众多学者提及，但大后方社团文学研究与抗战时期丰富的社团创作活动形成了巨大反差，与当时社团在抗战中起到的“鼓动”作用和历史价值明显脱节。和抗战大后方社团研究的薄弱现状相比，大后方社团繁荣的文学译介活动遭遇了更为严重的“遮蔽”，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专门就抗战大后方社团的文学译介活动进行过探讨，大后方社团的翻译文学研究还没有拉开序幕。因此，研究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对于整个中国抗战文学的研究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海外及中国港澳台地区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的研究：抗战大后方文学社团诞生于特殊的时代语境中，海外及中国港澳台地区曾举办过两次关于中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是1980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中国的抗战文艺运动”作



为讨论的专题之一；二是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抗战文艺运动学术研讨会。尽管有很多海外汉学家参加了这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针对中国的抗战文学和文艺运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获得了大陆学者难以想象的学术视野和眼光。但对中国抗战语境的隔膜和对中国文学审美方式的疏离，很多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其中对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十分有限，对大后方在抗战时期中国文坛上的特殊地位重视不够，没有人专门来探讨战争语境下的文学社团活动，对抗战大后方的文学翻译活动无人论及，更没有人谈及大后方的社团翻译文学。近年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海外学者开始反思战争带给人们的心理创伤，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大后方的重庆、桂林和昆明等地，开始关注大后方的文学社团，比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关根谦先生围绕在重庆活动的“七月派”进行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文学研究，但依然没有涉及社团的文学翻译和介绍活动。总体上讲，海外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对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还停留在把抗战大后方文学作为整个中国抗战文学或现代文学构成部分来研究的阶段，并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内容，更没有从抗战大后方的文学活动中剥离出社团翻译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生产和交流活动。

国内抗战大后方社团翻译文学的研究：中国大陆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重要时期是抗战期间，即20世纪30—40年代抗战大后方文学的发生和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配合抗战需要而对大后方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做出及时的评价和指导，使文学创作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声援民族抗战行动。因此，强烈的批判精神成了该时期大后方文学研究的总体特征。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研究首先集中表现为对文学情感内容的批判。比如1938

年2月20日,黎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诗人,你们往哪里去?》的评论文章,主要是对欧外鸥、柳木下、黄鲁、欧罗巴、胡明树和扬起等自称为“少壮派”的诗人出版的“一种漂亮的诗刊《诗群众》”提出批评。其次,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研究体现为对诗人创作思想的批判。比如胡风从大后方文学创作实际出发写了《今天,我们底中心问题是什么?》一文,批评了穆木天对抗战文学的看法,认为其关于“抗战文学底‘大部分’是‘个人主义抒情主义’,‘个人主义的感伤主义’”的看法“不是事实”。最后,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研究体现为对文学文体艺术的批判。比如,1942年,施蛰存在《文学之贫困》一文中针对抗战文学的现状提出疑问,认为抗战文学“贫困得可怜”。第二个重要时期是新时期以来至经济体制改革期间,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在大后方文学研究的热潮中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和提高。该时期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为多本专著的出版。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四川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比如《文学理论史选料》(苏光文,1988年),《诗歌研究史料选》(龙泉明编,1989年),《大后方散文论稿》(尹鸿禄,1990年),《战火中的文学沉思》(吴野,1990年),《大后方的通俗文艺》(杨中,1990年),《抗战诗歌史稿》(苏光文,1991年),《火热的小说世界》(文天行,1992年),《大后方文学史》(文天行、吴野,1993年),《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文天行,1994年);后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后方文学论稿》(苏光文,1998年)这套书系为我们今天研究大后方文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册,为抗战大后方文



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文本。21 世纪初叶,吕进等撰写的《20 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重庆出版社 2004 年)开拓了地域新诗史研究的先河,作为战时的抗战大后方,重庆繁荣的抗战文学诗歌成为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该书第二章《抗战时期:重庆新诗的第一次高潮》对抗战大后方文学组织、社团、文学刊物和重要诗人做了较为全面的“扫描”。但由于“史”的书写需要体大虑周,抗战大后方文学自然在这部文学史中没有得到详细的论述。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办的《抗战文艺研究》出版了三十多期,对大后方文学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体上讲,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还处于滞后的状态,已有的研究成果难以支撑起大后方丰富的文学创作活动。

就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而言:刘文俊先生的《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社团》一书是目前唯一研究抗战大后方社团的专著,该书所谓的社团包括“文化社团和非文化社团,而文化社团又可以细分为戏剧、音乐、美术、新闻、科技、教育、宗教等类,非文化文学社团又可以细分为政治、经济、体育、工会、妇女及同学等类”^①。因此,该书对文学社团的研究只涉及“文协”桂林分会,而对其他文学社团的讨论则着墨不多。朱寿桐先生撰写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是目前国内研究现代文学社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该书从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社团研究的关系入手,重点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主要文学社团的文学活动,比如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学衡派、新月派等社团与中国现代文学生态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成为该书的主要内容,显示出著者扎实的文学研

① 刘文俊:《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社团》,黄山书社 2008 年版,第 21 页。

究功底和敏锐的学术把握能力。但该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三个十年的文学社团涉及甚少，并且认为：“40年代的文学史主体框架中连这种文派现象也开始瓦解，结构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抗战以后，文派瓦解而归并为统一战线，左翼作家、鸳鸯蝴蝶派作家、自由派作家都联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个文艺阵地；战争形成的客观空间环境决定了文学的空间切块，可以将这些切块称之为‘文阵’。所谓大后方文学、国统区文学、孤岛文学、解放区文学等都是这样的切块，处在各种切块中的文人被迫放弃了文派运作的方式，而改为在不同的区域中自处于不同的阵地，于是这是一个‘文阵’的时代。”^① 相对于声势浩大的五四文学社团而言，抗战时期的文学社团似乎更加关注民族的解放独立以及自我内部创作思想的践行，很难在广泛而普适的文学层面上产生全国性的文学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抗战时期的文学社团就应该被所谓的“文阵”取代。相反，抗战时期的文学社团数量众多且文学旨趣各异，对其加以探讨和研究，同样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文学研究的深化。

所有这些关于大后方文学的研究或文学社团的研究其实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大后方文学社团的翻译文学。贾植芳先生说：“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② 谢天振先生说：“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翻译文学

① 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② 贾植芳：《译介学·序一》，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